

日本神也大大简化了包装，不用再套在脖子上捧在胸前，而被放到座位下边去了。没想到，这时溥仪向吉冈和桥本问了句：“神体安否？”以后提起这事，大家都对他说：“神都塞在屁股底下了，还来什么安否呢！”他尴尬地自我解嘲说：“我那是讽刺日本人嘛！”

飞机起飞时已经下午3点多钟，不久就降落在一机场上，等了一些时候，来了几辆小吉普车，这是我们头一次坐吉普车，直奔市内，接近黄昏时候，到了一家医院，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这里是通辽。我们胡乱吃了晚饭，就在炕上和衣睡了一宿。

8月17日 晴

一清早来了个苏联军官，言语不通，我好不容易才明白了他是来登记人名的，主要是要区别一下中国人和日本人。其实3个日本人昨天下飞机时就分开了。不过这苏联军官倒是非常认真的，挨个儿问了一遍。早饭以后，以溥仪为首的一行9名俘虏，乘车到机场，登上了苏军的大型飞机，飞往苏联。

（摘自玉季平主编《八·一五这一天》）

郑孝胥与伪满洲国

杨照远

郑孝胥（1860—1938年），字苏戡，号太夷，别署海藏楼、夜起庵。善工诗、书法，著有《海藏楼诗集》十三卷。综其一生，绝非仅仅是一介文人，他的主要活动是妄图借助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复辟清王朝。通过郑孝胥的一生，

可以清楚看到伪满洲国的出笼经过及其傀儡性质；郑的悲剧式的结局，则是洋奴汉奸的必然下场。

(一)

郑孝胥于1860年5月2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今福州）封建仕宦家庭。其父郑仲濂，清进士出身，曾历务翰林院庶吉士、工部营缮司、史部稽勋司主事等职。郑孝胥早年从叔祖郑虞臣学习经史，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郑20岁时补博士弟子员，隔年又在福建乡试中考取第一名解元（当时称为得士），为其跃进官场奠定了条件。其后，他攀高结贵，投奔于清豪门重臣李鸿章、张之洞、沈葆楨的门下充当幕僚，并为他们所器重。

1911年，郑在湖南布政使任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武昌起义爆发了，清王朝宣统皇帝溥仪逊位，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郑孝胥亦依然留着发辫，房中插着黄龙小旗，“凡付文筒札题识仍用宣统号子”，“始终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1923年，帝师陈宝琛、庄士敦以郑有“骨气”，道德文章、才干魄力在中国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为理由，推荐给溥仪入宫任职。

1924年11月29日，郑孝胥与庄士敦、陈宝琛、罗振玉等合谋挟持溥仪逃出了醇王府，假借医病躲入德国医院。然后，郑乘庄士敦赴英国、荷兰使馆联系“避难”之机，甩掉陈宝琛和罗振玉，单独到日本兵营同武官竹本多吉大佐和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后任日本外相）共谋，抢先“陪同”溥仪辗转“避进”日本公使馆，投入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

郑孝胥的阴谋活动得逞，并非偶然。这不仅因为郑与日本朝野上层交谊深厚，还因为进入20世纪初，日本侵略者为实现独占中国东北，在积极做好军事侵略准备的同时，正煞费苦心寻找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代理人。郑孝胥把溥仪送上门来，

真是适逢其时。这即是我国现代史上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典型。然而，郑孝胥为溥仪所设计的并不是通向恢复清朝统治的大道，而是出卖自身、出卖民族利益的歧途。

(二)

1925年2月，溥仪由日本便衣警特“保护”偷偷地由日本公使馆逃亡天津，寓居日租界“张园”，后迁至“静园”。郑孝胥被指派为“清室驻津办事处”总务主管。溥仪以其“御妹”指婚给郑的长孙。郑孝胥与溥仪的关系高出了当年“荣禄与慈禧之间那种程度”。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炸死以后，郑孝胥从芳泽谦吉和竹本多吉那里摸到日本东京方面的某种动向，便暂时放下追求各国共管的计划，束装东行，到日本去找黑龙会和日本参谋部。在东京等地，郑孝胥被当作中国宣统皇帝的代表，受到日本军部和黑龙会方面重要人物的“热心接待”，与日本一些幕后大人物如近卫文馨、宇垣一成、米内光政、平沼骐一郎、铃木贯太郎、斋次郎等频繁秘密接触，“讨论了复辟的事”。

1931年11月以后，郑更加紧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进程。关于这段活动，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吉田来信，土肥原至津，与司令部秘商，谓宜速往。对曰：‘土肥原是本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之参谋，乃关东军之要人，果来迎幸，则不宜迟。’明日以告领事馆。夜召土肥原。……”在郑的精心安排下，11月3日，溥仪于“静园”夜见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和伪政权主要策划者土肥原贤二，以在“东北建立帝国”为前提，达成溥仪出逃天津的协议。5日，在静园讨论赴东北“启驾”问题的“御前会议上”，郑与陈宝琛、袁大化、铁良等激烈争吵，极力主张溥仪潜行东北“复辟祖业”。10日夜，土肥原策

划了“天津暴乱”，溥仪在日本特务人员的挟持下，乘日“比治山丸”号汽艇偷渡白河（海河），郑孝胥父子在海上奉迎溥仪换乘日本轮船“淡路丸”号，于13日上午8时半，抵达东北营口满铁码头，致使溥仪落入日本臭名昭著的杀人凶犯内藤亚男（甘粕正彦）之手。

1932年1月，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取代了土肥原贤二。在同板垣的接触中，郑以灵活的手腕，博得关东军方面的好感。溥仪由于放不下皇帝的架子，先是不愿屈任“满蒙共和国总统”，为此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两次约郑孝胥赴沈阳，与早已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奉系军阀、政客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等一起，策划了建立伪满洲国政权的事宜；郑孝胥私下向本庄、板垣表示，只要让他出任未来的内阁揆首，“皇上的事由我包办，无所不可”。2月23日，板垣回到旅顺，把成立所谓“新国家”的决定摊给了溥仪。当即在元首称号上发生了争执。郑孝胥便威胁说：“日本人说得出做得出，眼前这个亏不能吃。何况日本原是好意，让皇上当元首，这和做皇帝一样。臣伺候皇上这些年，还不是为了今天。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铺盖回家！”听了这话，溥仪发了慌，无奈只好“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遂令郑与板垣谈判。郑乘机同板垣拟签了出卖东北的条约，并审定了伪满洲国国歌歌词和年号。

（三）

1932年3月6日，在日本关东军第四课的导演下，开始了傀儡登场的第一个程序。3月9日，溥仪于长春前道尹公署粉墨登场，就任了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当了伪国务总理，并获“建国功劳金”（又叫机密费）30万元；其子郑垂、郑禹也得到了国务院总理秘书的头衔。关于郑捞取总理位置，溥仪在《我

的前半生》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形象地描述：“当天下午，在执政办公室里，郑孝胥送上一件‘公事’：‘本庄司令官已经推荐臣出任总理，组织内阁，他微躬着身子，秃头发光，语言柔和，‘这是特任状和各部总长名单，请签上御名。’这原是在旅顺时日本人甘粕正彦早跟我说好的。我默默拿起笔，办了就职后的第一件公事。”

1932年9月15日，郑代表伪满洲国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在伪皇宫勤民楼正式签署了《日满议定书》，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力和利益”，实际上也就是确认了日本关东军对“满洲”的实际统治。“日满议定书”早在旅顺时，就由郑孝胥与板垣议定采了的，它有十二条款，另有附则、附表及附属协定，主要内容为满洲国的国防及维持治安，全都“委诸”日本管理，所需经费由伪满负担；伪满的铁路、港湾、水路、空路包括增加修筑，均“委诸”日本管理；日本军队所需要的“各种设施”，由伪满“援助”，日本人得充任伪满官吏，而其“保荐”和“解职”均由关东军司令官决定等等。从“议定书”的议定过程和內容，不难看出溥仪的执政、郑孝胥的国务总理，均是由牺牲我国东北的一切权益换来的。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把满洲国打扮得更像一个“王道国家”，应允更名为“满洲帝国”，改“执政”为“皇帝”。这并不意味着伪政权的傀儡性质有任何改变。但是，郑孝胥梦寐以求能够追随溥仪做一个正一品珊瑚顶戴和三眼花翎的“后清”丞相，因此，他不遗余力为溥仪重登皇帝宝座四处活动，费尽了口舌，关东军才勉强答应在行告天祭礼时溥仪可以穿穿龙袍，可是在举行登极典礼时必须穿用他们设计的“元帅正装”。溥仪总算又过了一次皇帝瘾，郑也总算当上了“总理大臣”。然而，这

一切都纯粹是名义上的，实际权力却完全操纵在日本人担任的总务厅长官手里。

郑孝胥自以为凭着他与日本上层人物的“交谊”和建国“功绩”，总可以捞到部分实权，但迭经周旋，总不见效，心里憋着一股火。1935年5月，他在王道书院讲演时，借题发挥，发了一通牢骚。他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应让它自己走走，不应总是处处不放手。”不曾想惹恼了太上皇，郑讲演完毕刚回到家里，其官邸即被日本关东军包围起来。郑慌忙给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打电话求助，虽免遭逮捕，但被撤职的命运却不可避免了。5月11日，南次郎到伪皇宫勤民楼向溥仪宣布“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需要让他养老”。10天后，张景惠取代郑孝胥，出任国务总理，各部大臣同时亦有变化。

当然，郑被赶下台，决不仅仅是因为他讲了几句牢骚话，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对其它帝国主义列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妄图实现“国际共管”表现出一定的热情，这就从根本上同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东北的既定决策发生抵牾。郑丢了官，连30万元“建国功劳金”也被关东军冻结了。郑想迁回北平闲居，亦遭关东军的斥责。郑只好蜷居在长春柳条路私宅，写写字，作作诗，打发着残年岁月。

1938年3月28日，郑孝胥病死于长春，了却了汉奸卖国的一生。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1期）